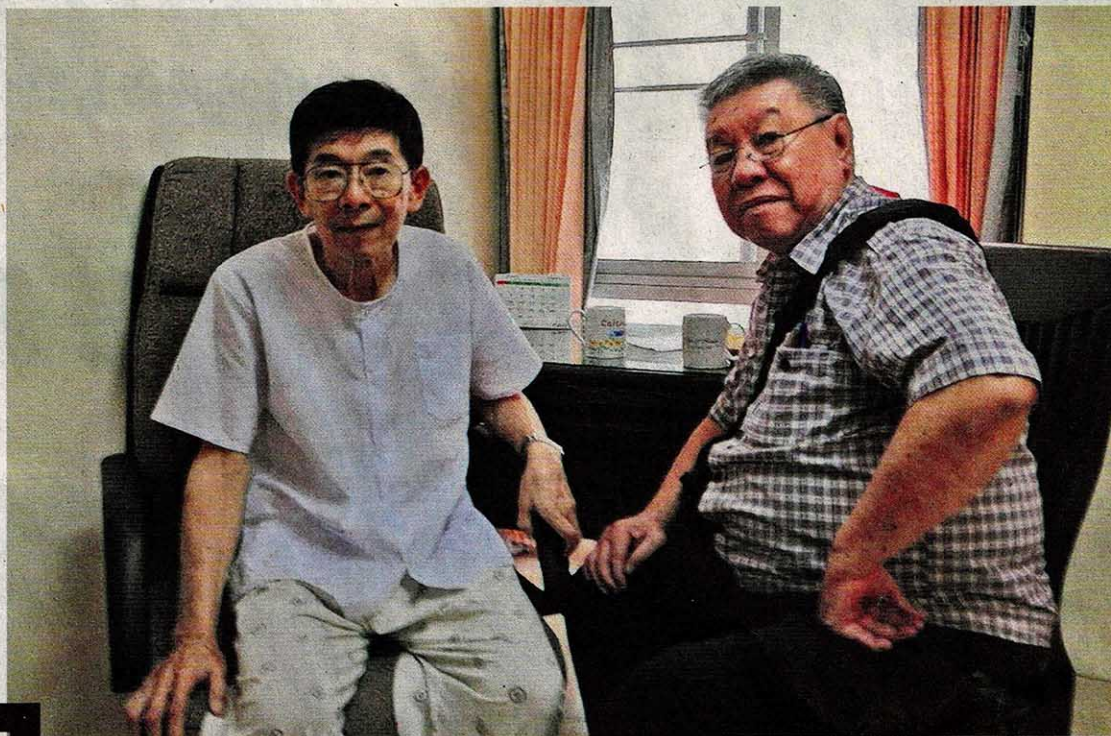


打开话题……
的作家贺巾。互相问候之后，他慢慢和《小茅屋》及许多短篇小说而驰名。我见到了这位当年因《沈郁兰同学》在曼谷郊区一间平实的公寓里，



陈国首与贺巾（左）在曼谷见面。（作者提供）

贺巾谈创作与人生

陈国首 / 文

秋高气爽的10月，我和一位最具争议的小说作者贺巾有了一次会晤，畅谈他的创作心路。

去曼谷前向贺巾在新加坡的亲人拿了电话号码，一到曼谷迫不及待地挂了一通电话，接电话的是贺巾的妻子，一听到说是从新加坡来的，便乐不可支地找来贺巾。贺巾今年77岁，比我长一岁，他不久前坐轮椅，如今已能靠拐杖慢慢走动，但很少出门。第二天，他嘱咐儿子到我的住处接我去他家。

贺巾原名林金泉，笔名有：邵虹、韦嘉、贺立、于琴、高静朗、古戈及颀军。他原籍广东澄海，1935年在新加坡出生，小学读三山学校，中学在华中及中正总校就读。1954年他辍学到丽的呼声当广播员，当时初三还没念完。

他当过派报员、印刷馆学徒、建筑工人、电台播音员，编写过广播剧，也当过华校教师、农牧业管理员及商业文书，也曾曾在曼谷从商及打工。

贺巾已出版的短篇小说有：《青春曲》《沈郁兰同学》《可爱的家庭》《渴望和平》《尊严》《小茅屋》《青青草》《阳光与雾》《小偷的故事》和《迟到的礼物》等，这些是早期作品；后期出版过短篇小说集《峥嵘岁月》、长篇《巨浪》及《流亡》等。

再遇“小老师”

1954年5月13日，华校中学生要求缓役，展开请愿，在皇家山公园遭殖民政府的镇暴队殴打的流血事件发生后，我参加公教中学同学们的静坐罢课而被开除学籍，后来到华侨中学参加“集中”以示抗议。当时除了认识到必须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之外，对学生运动其实懵懵懂懂。“集中”的日子里，贺巾是很受欢迎的小老师，无论在篮球场或在课堂开课，总是挤满许多同学。

他当时身体健壮，很帅的脸庞，斯文且风度翩翩。最让我佩服的是他讲一口标准的国语（当时叫国语，不叫华语），字正腔圆，同学们都听出耳油，尤其女同学们更喜欢听他的课。他通常是分析时事，讲得有条有理。

多年后，我在退休后经泰南合艾到雅拉，乘专车进入和平村。有好多位曾参加过森林战斗，与我从不相识的中老年人到招待所来寒暄，问起外边的情况，原来他们不少还有亲人在新加坡。

在招待所里我第二次见到贺巾，他依然是多年前在华中见过的样子，笑容可掬，风度翩翩，肤色比以前黝黑了。

虽是第二次见面，我们却是首次互相认识。惊奇的是，他对我的身份非常了解，知道我曾是报社记者，我们聊起各自的写作。过了些时候，我和妻子又一次到和平村，还特地买了一瓶酒送给贺巾。另一次见面，我和妻子到曼谷旅游，到他家中拜访。贺巾夫妻请我们吃一顿热腾腾的饺子，还送给我他的新作《峥嵘岁月》和《巨浪》。

这一次是第五次见面，我们都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。

《沈郁兰同学》

1954年，我在《耕耘》杂志上读到了一篇短篇小说《沈郁兰同学》，当时有人说作者是韦嘉。作者写了他所熟悉的学生生活，引起许多同学的注意。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，学生为要求缓役而与殖民地政府对抗，可说是合情合理。作者抓住时代脉搏，把事件通过女主人翁沈郁兰表现出来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可是，当时有些人仗着偷偷读了一两本中国出版的文艺理论禁书，宣扬自己的左倾言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，把别人的作品评得一文不值，甚至把作者挖到体无完肤。更可笑的是，那些评论者还说“沈郁兰”的形象没有苏联大革命时期的英雄“保尔”和“牛虻”那么令人感动。

笔者认为，评论者都在吹泡泡，他们不知道，泡泡也会有被吹破的一天。

《沈郁兰同学》的作者写这篇作品时，是一个连初中都没念完的学生，他登高一呼，让好多热爱生活的学生振作，甚至疯狂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

在曼谷郊区一间平实的公寓里，我见到了这位当年因《沈郁兰同学》和《小茅屋》及许多短篇小说而驰名的作家贺巾。互相问候之后，他慢慢打开话题，说话节奏较慢，因为他患有帕金森病，讲话时还把脸稍微侧向右边。

他说他目前患有眼疾，很难继续写作，两三年前写完长篇小说《流亡》之后，便不再伏案。

谈到写《沈郁兰同学》，他说：“我只想写一些大家熟悉的人物献给我



五十年代的新加坡。（档案照片）

“我只想写一些大家熟悉的人物献给我亲爱的朋友，只要他们读后觉得：这是我们的朋友，曾经并肩奔跑，曾经紧紧拥抱的朋友！只要能唤起他们回忆那段美好生活的意义，这就够了，一切都够了。一句话，这只是想做个纪念。”

——贺巾

亲爱的朋友，只要他们读后觉得：这是我们的朋友，曾经并肩奔跑，曾经紧紧拥抱的朋友！只要能唤起他们回忆那段美好生活的意义，这就够了，一切都够了。一句话，这只是想做个纪念。又因为要更直接地，更亲切地描写，我决定以第一人称来写，这也是为了方便。”

停下喝了一口水，他继续说：“至于为什么偏写女主角而不写男性？因为在这一事件，这个时代，这个地方，女孩子身受双重压迫，她们的痛苦比男同学更深，她们前进中碰到的阻碍也比男同学更多更大。”

贺巾说，他写作的习惯是在小学时养成的，每天写日记。念三山学校时，叶在封老师批改他的作文，很认真看待，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，每周写一篇作文不够，还要写一篇周记。小学毕业时，在叶老师指导下，他得到作文比赛第一名。进入华中后他遇到唐锦云老师，唐老师很喜欢他的作文，给予诸多鼓励。

《小茅屋》的创作

1950年，华侨中学发生大逮捕事件，不少老师和同学被捕，学校被封，他感到非常不满，萌起要进入华中的念头，为的是要增加一分学生的力量。进入华中后，他发起组织戏剧会，担任第

一任副会长。戏剧会筹备演出《打渔杀家》，他负责剧务工作。岂料演出前夕，学校接到政治部一纸命令，说《打渔杀家》禁止上演，这晴天霹雳让同学异常气愤。贺巾说这一段经历，后来写成短篇小说《青春曲》。

“后来我去丽的呼声工作，看到一些女同事家庭有些问题，感觉到她们在工作与生活方面很空虚，经常逛百货公司，打麻将，好的就搞话剧广播剧。后来我以教育界的情况写了《可爱的家庭》，《时代报》总编辑杨君把它改为《走上新生的道路》并在该报连载，那就算是中篇了。”

因为锋芒渐露，当局开始注意他。他离开丽的呼声后到乡村去。他感觉到年轻妇女没机会读书非常可惜，便搞夜学班辅导她们。他和朋友大规模办夜学补习班，普及到东海岸、樟宜。由于要普及到较偏僻的乡村，他们甚至在戏台上办夜学班。

贺巾说，他初三还没念完便辍学，有朋友读厦门大学的校外函授课程，有空时他便向朋友借函授讲义来学习。就在那时候，他那著名的短篇《小茅屋》短篇也完成了。

谈到《小茅屋》的创作经过，贺巾说：“我当时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里，

邻居有个孩子很顽皮，父母没法管教。这是一个真实人物。我就想要怎么样开导他。开始接近他时，才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多么美好，因为我已走入他的精神世界。当时有一种想法，如果学校老师多少能走进小学生的精神世界，多了解他们一点，就不容易产生误解。

“那孩子在家里是不用养猪的，不过得到池塘去捞浮萍当猪食，我便帮他捞帮他砍。要洗澡就在池塘里洗，他不会游泳我就教他。再一次，我故意潜到水里很久不冒出来，他急得呼天唤地，还回去招人说我入水被淹了。这事虽然好笑，我却觉得这孩子很可爱。”

“创作《小茅屋》时，那小孩成了小说的主人翁，代课老师则有我的原型。本来我有企图在教育这个行业里增加一些新鲜感，在教学上要怎样融进教学内容。后来要出版，找不到出版单位，当时有个刊物叫《教育月刊》，投稿去，他们说太长了，必须删掉一半，我做不到。后来把它交给一位朋友，想出一个单行本，两万到两万多字，当时的短篇字数多数是这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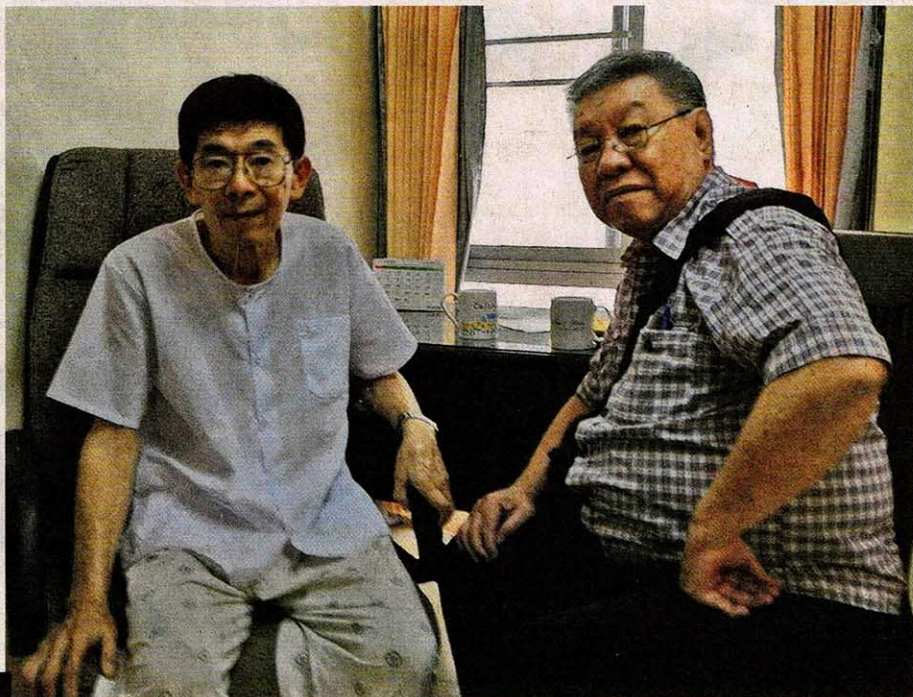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章刊出后有人有意见。好友告诉我，有人批评我的《小茅屋》不行，否定了老教师的教学经验，有意抬高代课老师。我说自己的本意不是这样。后来还有好些人议论这篇作品。”

“想不到有位姚先生还为我出版了《小茅屋》单行本，是我妹妹后来告诉我才知道的。出版之后，据说他带了好几百本过长堤到马来亚去销售，销路很好。后来我到马来亚，有很多青年对我说，‘我看过你这本书。’”

“在新加坡写的另一篇小说当时也出现一些情况。本来《阳光与雾》在投稿时名字只是《雾》而已，主题是讲爱情生活如果不正确，就好像迷在雾里，编者改成《阳光与雾》。写这篇小说是1960年，当时我和妻子还没有结婚，几个人在读，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，突然有人闯入我们的篱笆并冲进屋子。我们在房里，对方没看到。客厅里有个小妹质问对方，证实他们是政府人员后，我们在房里的人便见机撤走，便衣人员无可奈何也跟着走了。”

“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回来了，小妹哭说着说那稿纸在紧急时被烧掉了。我安慰她说烧得好，要不然稿子被拿去做证据会更糟，我说可以重写。一两个月后，我把那篇小说重新写出来，那时记性好。那应该是我在新加坡写的最后一篇小说。”

（待续）



题……

家贺巾。互相问候之后，他慢慢打开话
《小茅屋》及许多短篇小说而驰名的作
见到了这位当年因《沈郁兰同学》和
在曼谷郊区一间平实的公寓里，我

贺巾谈创作与人生(下)

陈国首 / 文

1962年，贺巾到印度尼西亚去教书。1965年9月30日，印尼发生政变，许多左派人士被杀，华校也被封，贺巾于是到一个渔村去教书，他教的不是华校，而是国民学校，当局不能封闭。他一直教到1967年、1968年间。本来可以继续教下去，不巧学校发生火灾被烧毁。当时他被怀疑是印尼共产党党员，有人要逮捕他，却找不到证据。后来他到棉兰当菜农，每天挑100多担水浇菜，妻子则养猪养鸭，前后有六年多。1976年他离开印尼到港澳，再转去中国。

他原本打算再转到泰国进入部队，但当时马泰边界发生剧烈战斗，他便被安排到湖南，在马共地下电台“革命之声”担任撰稿，多数是从新闻或杂志上取得资料，加工写成专题报道。在电台呆了近两年，1980年终于到泰国进入部队。

继续创作

在部队里，有人听说他曾在新马两地写小说，就向他约稿。他希望在部队刊物每月出版时都写一则短篇小说，但刊物出版很不定期，有时拖上三两个月。刊物是手抄手印的，一般印几百本。他陆续写了些反映地下的、反映战争的作品，一直写到1989年组织与马来西亚政府及泰国政府三方面的和平谈判成功为止。

“据说在这过程中，因为不方便携带，你烧掉不少作品？”我问。

“在印尼的时候写了一篇怀念朋友被屠杀的悲惨经历，大约6万字，因为突然要离开印尼而烧掉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很想再把它写出来。”

“下山以后，泰国有一家《世界日报》，是台湾人办的，它有文艺副刊，该副刊办了一次文学征稿，我就写了一篇《记忆中的加冷河畔》，讲述我写作的启蒙，我为什么喜欢文学，从我童年在加冷河畔所看的风景和遇到的事情写起，结果获得优秀作品奖，得到20美元的奖金。”

“主编于是向我约稿，我就供稿，有散文、诗歌、评论及短篇小说。很多反映部队战斗的小说或文章当然没有机会在新马发表。”

“我是1980年进山，期间都有收集写作素材，但很散乱，搬了几次家，毁了一些。1995年我下山，完全退休，没有职务了才真正写稿。《峥嵘岁月》1998年出版，《巨浪》是2004年写好，写‘五一三’学运，同年出版，并在吉隆坡举行新书发布会。记忆没错的话，《巨浪》写了七八个稿，改了又改。”

贺巾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流亡》，两年前在马

来西亚出版，写他在印尼的流亡生活。他托朋友带了一本给我，可是我一直没收到。

他说，有人建议他把部队题材写成小说，不过这不容易，因为重点要放在哪里很重要。他写有关部队的小说，多数是关于基层战士对生活的思考，还有婚姻、家庭及同志间的关系等，大块头的题材，如政策、路线、战役等方面都没有。

这次访问，贺巾屡屡忆述自己的创作，听了真是大收获。我们没多谈有关思想问题、政治课题或斗争路线等。

从学生运动中得到养分

贺巾是华中戏剧会的发起人及首届戏剧会副主席，我是第三届副主席，我们都是好戏之人。我向他表明我有意将我的小说《敬你一片蓝天》改编为舞台剧，他深表赞同。

他说：“这想法很有创意，小说本来就有强烈的舞台剧格式，如果改编得好，一定很感动人。”

分手前，我向他提出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：“你对当初选择走的路，有感到一点点后悔吗？”

我明知他心中的答案，但我还是想从他口中听到他说的那个答案。

“无从后悔！”他斩钉截铁地回答。“当时同学们的切身利益是那么重要，反殖运动也那么重要，反殖运动也那么重要，很重的责任压在你身上，你哪有什么不管放下就走的道理？也就是这种责任感把你逼上梁山去面对，根本不想后果，后来就越干越起劲。”

“学生运动当时是势在必行的，没有给你犹疑的余地。反过来说，从搞学生运动与反殖民运动中，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和养分，这正是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。”

——贺巾

我问：“如果说，回头再有一次机会的话，你会做何选择？选择置身事外专心于文艺创作，还是继续搞学生与反殖运动？”

贺巾说：“毫无悬念，当然是继续搞学生运动，搞反殖运动。同时腾出些时间写些有益于大众的小说。”

我说：“不过，在时间上是很难分配的呀？”

贺巾说：“学生运动当时是势在必行的，没有给你犹疑的余地。反过来说，从搞学生运动与反殖民运动中，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和养分，这正是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。”

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位年轻时在恶劣环境中一直想多读书来充实自己的作家，如果当年能如願多读些书，后来又有个安定的环境让他写作，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充实更富有内涵的作品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

(续完)